

日治臺灣校園活動與學校文物

文·圖片提供／蔡錦堂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退休教授）

臺灣的近代教育雖始於清末基督教傳教士在臺南、臺北兩地的耕耘，但基礎的奠定主要還是在日本統治時期。不可諱言的，日本式近代教育帶有殖民色彩，夾雜著差別待遇，但是也藉由日本的統治，將西方的近代化內容，融合日本式教育帶進臺灣，讓臺灣得以擺脫部分傳統，融入國際社會中。短短五十年的日本統治，特別是1920年代以後的後半統治時期，許多中等學校、專科學校、職業學校、女子教育，甚至高等教育機構的設置，使臺灣能夠培養基礎以及中高等人才，讓臺灣即使在二戰日本戰敗離開之後，仍有許多各級中高等「臺灣省籍」人才存在，得以支撐整個戰後臺灣的建設。

本文承繼上一期的「中等教育」主軸，從日治臺灣「校園活動」觀看學校的教育文化，也藉由現在各個學校或許尚存的各類「學校文物」，了解與思考日本時代的近代教育內涵。

校園活動

日治初等教育的公學校或小學校，課程除了修

身、國語（日語）、算術、漢文、地理、理科等科目之外，還有供男生實習的農、商、手工，以及供女生學習的裁縫、家事課程，另外也有圖畫、唱歌、體操。初期，圖畫、唱歌、體操課程並不受漢人家長重視，甚至加以鄙視，但漸漸的這些傳統書房教育所沒有的近代化教育內容，開始為臺灣家庭社會所接納並歡迎，遊戲、遠足、運動會、遊藝會在小公學校校園中展開，變成常態，且是兒童最喜歡的活動。

1920年代前後，因兩次〈臺灣教育令〉的頒布實施，帶來臺灣教育重大變革。雖然差別教育仍然存在，但學制已可銜接日本本國，臺日人可共學，臺灣各地也陸續設立了十七所男子公立中學校（修業年限五年）、十三所公立高等女學校（修業年限四年）作為中等教育機構，甚至專科教育（臺北醫專、高等工業、高等商業、高等農林學校）、高等教育設施（臺北高等學校、臺北帝國大學）也建構完成，培育出臺灣籍的菁英層。



▲臺北第三高女勒題和歌披講會。（圖片出處：小野正雄，《創立滿三十年紀念誌》；臺北：臺北第三高等女學校同窗會學友會，1933年）

這些學校的校園活動，比起日治初期更為多彩多姿。以「運動」項目來說，各級學校設有劍道、柔道、弓道、游泳、野球（棒球）、ラグビー（橄欖球）、ホッケー（曲棍球）、庭球（網球）、陸上競技、登山，甚至相撲、騎馬活動，或成立相關的「部」（社團）。

我們翻閱各級學校的歷史，例如眾所周知1928年始成立的嘉義農林學校野球隊，三年後的1931年即獲得全臺灣中等學校於臺北比賽的冠軍，並代表臺灣赴日本參加第十七回夏季甲子園中等學校野球比賽，三勝一敗得到「准優勝」（亞軍）。魏德聖亦將此事蹟拍成電影《KANO》。另外，原英國長老基督教會創立的私立長榮中學校的足球隊亦相當有名。該校第三任校長萬榮華為學生引進英式足球，日文稱「蹴球」，1940年長榮蹴球隊贏得全島中等學校蹴球比賽冠軍，並赴日本參加第二十二回全國比賽，雖不幸第一場即落敗，但也可看出臺灣中等學校校園運動的風氣與多元性。

當時的學校也成立各種「部」（社團），這是學生在學業之外的生活重心之一，有運動性質的（例如劍道部、柔道部），也有較靜態的文藝性或知識性的社團。例如臺北高等學校就設有劍道、柔道、弓道、園藝、辯論、文藝、新聞、繪畫、音樂、俳句會、演劇研究會以及航空研究會等等的「部」，這些學生社團除了校內活動，也常全島東征西討，甚至東渡日本內地參加全國高等學校的競技大會。

例如臺高時期的李登輝即曾參加劍道部，而以「臺灣萬葉集」聞名、獲得日本菊池寬賞的和歌詩人吳建堂，也是劍道部成員，後來更是劍道八段的名人；王育霖、王育德兄弟及日本直木賞作家邱永漢，皆是辯論部、文藝部的成員。參加校園社團，以及撰寫、編輯社團出版刊物如《翔風》、《臺高》的文章，對他們未來人格特質的塑造，均產生重大的影響。

有些學校為住家距離較遠的學生提供「寮」（或稱寄宿舍）的設施，以減輕舟車之苦，方便住校學習。這種住寮的生活學習，也形成了中等以上學校的校園活動文化之一。嘉義農林、臺北一高女、三高女、臺北工業學校等中等學校都有寮的設施。

以臺北高校的「七星寮」作為觀察對象，臺高的七星寮並非全寮制，而是以外地的學生優先入住；寮設有舍監，由學校的教職員擔任，並訂下規約，視七星寮為「自治寮」。學生與學校間歷經若干次要求與衝突，大致上維持寮的獨立性與學生自主管理制度；宿舍衛



▲臺北高校住宿生在七星寮萬年床舉辦「別離之宴」。

生與炊事、總務、文藝、運動，均委由學生自主自治。臺高七星寮雖也如日本第一高校等高校，有「寮雨」（從宿舍高處往下放尿）、「萬年床」（床鋪棉被長年不摺疊整理）和「ストーム」（storm，意指學生並肩攀搭高聲唱歌與跳舞）的現象，但是基本上學生可以從住寮生活中，學習到「自治與自由」的高校校園文化。學寮每年訂有「寮祭」日期，公開宿舍給親屬朋友參觀，同時進行一些活動。例如學校的「紀念祭」（類同校慶），由學生自主舉辦演劇、展覽等活動，「寮祭」也將學校「真實的一面」公諸於家屬外賓眼前。

由學校主辦的活動，除了在近郊遠足之外，還有跨域至其他城市的「修學旅行」。修學旅行也分只在臺灣「島內」，或到日本內地，甚至遠至滿洲、朝鮮、日本內地的修學旅行。

所謂「修學旅行」，是指小學生或中、高級學校學生在學校教職員率領下，到日常所無法經驗、學習的地方，實際參觀該地的自然、歷史文化、產業等的學習之旅，以加深一般課堂內無法



▲ 1937年，嘉義農林修學旅行，於鎌倉大佛前合影。

學習到的知識和情操。日本自1877年開始經常性的實施修學旅行，算是屬於教育課程中，遠足、旅行之類的學校特別活動。

根據鄭麗玲的研究，1897年7月總督府國語學校二十五名學生前往日本內地的東京、京都、大阪等地，或許是臺灣最早出現的海外修學旅行。以1924年臺北工業學校的內地修學旅行來說，行程約二十六天；臺北第三高女從1930年前後起，到1939年則舉辦了十回的內地修學旅行，每次約二十多天，出發前會先去臺灣神社參拜，祈求旅途平安。

1937年5月7日，嘉義農林學校從基隆港出航，途經滿洲、朝鮮、日本內地，6月6日回到基隆港的「滿洲・朝鮮・日本內地修學旅行」，則是長達一個月的跨域長途旅行，這並非利用寒暑假或畢業時期的旅行，而是在4月初開學不久的學期中進行，且並非為畢業班所舉行。

日治時期的修學旅行被正式教育法規列為「教育課程」的一環，與現時臺灣一般「旅行」的性質有很大不同，如此「寓教育於旅行」的制度，值得吾人思考與玩味。

學校文物

現今距離臺灣中等以上學校大量設立的1920年代已經有百年之久，離終戰的年代也已經七十多年，臺灣各學校有關日治時期該校或其前身的公文書、簿冊、文物，有些學校因某些機緣將這些資料文物設立校史室善加保存維護；但



▲臺北第一中學校友會誌《麗正》（1935）、《臺中第二中學校友會誌》（1939）。

有些學校也可能因為各種緣由未能收藏而讓文物淪為廢棄物，或者也有些文物因為管理機構不清楚其史料價值，讓它們仍留存在某些庫房的陰暗角落，尚待出土。無論如何，在各學校校園中，或許尚存一些史料文物，希望這些文物能夠再度被重視並得到適當的收藏維護。

以下簡單披露哪些史料文物值得收藏保存：

1. 學生「學籍簿」與教職員「履歷書」：這兩種基本珍貴資料可以說是建構學校歷史最重要的資料。學籍簿裡會有學生的基本資料，包括家庭地址、家長或保護者姓名、學業成績排名、出缺席、身體健康狀態等；教職員履歷書會有原籍寄籍身分地址、官職位動、薪資賞罰、學經歷等人事資料。這兩者是建構學校歷史的重要資料，但也會有宜保護的個資問題。
2. 畢業紀念冊與畢業證書：這些資料可以提供各屆學生在學中的實際學習、生活、校園活動照片，非常有助於校史故事的撰寫。
3. 學校沿革志、校勢一覽、校友會誌：

是提供重要校史編寫的文字資料。

4. 修學旅行寫真帖、照片：對遠足、環島旅行，甚至日本內地跨域旅行，藉寫真帖的照片資訊，可提供實質可信的參觀城市、史蹟、機構的旅行資料，也可與學習過的教科書資料內容進行比對。
5. 校園內存在或曾經存在的銅像、石碑、殘蹟：這些具體文物或許已經被摧毀、竄改，但不失為曾經存在過的歷史見證。
6. 奉安庫（或稱奉安櫃、奉安殿）：這是日治時期保存日本天皇、皇后御真影，以及置放教育最高指導原則「教育勅語」謄本的保險庫，是日治時期學校最神聖的所在。許多學校不見得知道這一點，因此它們常被置於倉庫的陰暗角落，也有仍被當作一般保險金庫使用者。
7. 印章、校旗、帽徽、制服、手搖鐘、風琴等其他文物。

日治時期學校文物的發掘與保存、維護，除了可以增加學校教育歷史的深度外，對於臺灣整體的歷史內涵發掘、故事的陳述，也有重要的意義。☞



▲北一女中出土校訓石碑。



▲臺北中山女高的奉安庫。